

---

# 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步 平

---

1999年伊始,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召开了中日军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由以研究中国现代史著称的卫藤沈吉先生和山田辰雄提议召开。卫藤先生曾任东京大学、亚细亚大学校长,现任东洋英和女学院院长,山田先生是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

参加讨论会的中国大陆学者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金冲及教授、国防大学教授何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傅吉庆、复旦大学教授余子道和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5人,3位台湾学者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鹏仁、总干事刘维开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凤翰。在会议上发表论文的日本学者虽然只有两位,即军事史研究家森松俊夫和原刚,但是出席会议参加讨论的日本学者却有50余人,他们有来自东京的,也有从京都、大阪、广岛甚至北海道赶来的。另外,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研究或留学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也有约30人参加了会议,所以会场上的学者每天都在百人左右。

会议在1月30日和31日进行,虽然只有两天,但是时间利用十分充分。卫藤沈吉、金冲及、刘凤翰分别在简短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讲话,会议主要时间分为四场报告和讨论会,由山田辰雄、左近允尚敏(日本安全保障研究所)、金冲及、茅原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分别主持,每篇论文的作者有40分钟的发言时间,另有

40分钟为评论时间。评论都是由日本学者分别准备的,他们是石井明(东京大学)、西村成雄(大阪外国语大学)、松浦正孝(北海道大学)、卫藤沈吉、姬田光义(中央大学)、石岛纪之(フェリス女学院大学)、秦郁彦(日本大学)、安井三吉(神户大学)。

在会议筹备时,东道主曾考虑到学者来自各方,为创造客观研究历史和充分发表意见的环境,确定了不采取统一的主题进行讨论的原则,所以提交会议的论文涉及范围比较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有些文章涉及到共同的问题,可以从中看出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只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大部分问题未及展开讨论。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整体的认识,特别是关于国共两党和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分析和评价,在许多学者的文章中有所涉及。总的来看,大陆方面的学者比较强调全民族抗战的意义,对国共双方的抗战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对在抗日战争中发生的国共间的矛盾与冲突,也有比较客观平和的论述,基本上反映了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现状和成就。

何理教授在《中国抗日战争是整体的民族战争》的文章指出:中国抗战是在基本统一的军事、政治、外交战略下进行的民族战争,这场战争所表现的全民族参战的整体性、完全意义的反抗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正义性,都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无法比拟的。由于在抗日战争后国共两党很快陷入分裂和战争,所以两党合作,团结抗日的正面历史被长期严重对立的政治攻击湮没了,歪曲了,从而使抗日战争的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至今未能得到明晰和解决。

为说明上述命题,何理首先分析了抗日战争期间两党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的认识,指出两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政策虽然发生过重大的变化,在对国际关系的认识上也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坚持独立民族战争的主轴线却是基本一贯的。接着,他

分析了两党关于抗日的战略方针,认为在坚持持久战的认识上,两党的见解也是一致的。不过,在具体的实施上,不可否认有原则的差别。共产党的持久战基本是政治战略和政治方针,注重于政治和民众的动员,在作战方式上侧重于游击战;国民党的持久战多从军事上着眼,注重于政府和军队的行为,比较重视正规战。他认为,抗日战争期间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彼此配合的。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是正面防御作战的主体,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友军作战,合作抗战的关系很好。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两个战场在战略上是相互配合支援的,但是因为国民党连续两次发动反共高潮,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在空间上与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处于脱离地位,在战役上已经不能进行直接的配合。在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两个战场的关系由主动变得比较被动,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在具体战役过程中就难得配合了。

何理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摩擦是关系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根本问题,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上是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不过,这样的摩擦包括公开剧烈的武装冲突,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全国抗战的大局,也没有被日本利用,所以不能否认两个战场和民族战争的统一性。

关于如何评价两个战场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何指出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全国抗战的主体。而在持久抗战的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后,正面战场的作用地位开始下降,敌后战场的作用地位开始上升。太平洋战争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

傅吉庆研究员在《论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中则专门对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进行的,敌后战场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

是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客观可能性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它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战场。他在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4个敌后战场的开辟、发展、巩固和扩大的艰苦斗争过程,指出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建立的19个总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牵制消耗了数十万日军,为夺取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敌后战场能够逐渐壮大的原因,傅吉庆分析有:一,实行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能够发挥全民族的综合力量;二,建立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三,建立和健全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四,发展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五,发扬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傅吉庆的文章列举4个理由进一步说明:开创敌后战场是战略上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正确选择。首先,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对敌军构成两面夹击的有利态势;其次,破坏了敌军的后方基地;第三,充分发挥全民抗战的威力;第四,便于进行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他还从分析中共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的实施和抗日根据地以及抗日军队的建设入手,论述了敌后战场能够在抗战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成为坚持持久抗战的有决定意义的战场的原因。

针对评论和提问,傅吉庆进一步阐述说:他论述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否认正面战场的作用与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敌后战场也有积极的作用与表现,今后有条件也可进行研究和论述,只是由于资料的关系,在这一篇中只能以论述共产党方面的敌后战场为主。

刘凤翰研究员提交的《抗战对中国军事的冲击》一文,引用大量资料,对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构成、演变进行了分析。他从规模

和数量上具体分析排比了原来只有 200 万的中央军在经整编、统编、扩编后发展到 650 万的情况；列举了经各界人士扩充的 80 万正规军与游击队的情况；列举了投降日本或被日军允许建立的各地伪军的情况；也分析了由红军而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各部队的情况。对上述各部队的编成、演变、所辖军区情况，各军、师驻地以及首长等都列出了详细的数据与名单，足见他在研究抗战军事史方面已经掌握了相当充足的资料。

刘凤翰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总之，抗战给中国军事冲击太大了，弄得中国遍地皆兵，社会结构彻底破坏，国穷民困，造成抗战后，中共军队以新兴势力，对付内部党争、贪污、腐化、老大的国民政府，最后占领整个大陆。他认为这一起因是原本仅为地方冲突的卢沟桥事变。事变之后，中日双方在彼此的矛盾中盲目地打了八年之久，造成了两败俱伤。对于上述立论，在该论文“中日双方作战盲点”一节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提出中国方面作战的盲点是：一，卢沟桥事变后，虽与日本交战，然而牺牲是否真的已到“最后关头”？作者认为问题在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作祟；二，卢沟桥事变发生之际，日本尚无全面入侵中国计划，中国本应立足地方交涉，局部解决，发动全面抗战实属草率；三，卢沟桥事变后，没有利用华北空间与日本周旋以争取时间，于忙乱中发动全国艰苦抗战；四，没有巧妙利用日苏冲突将日军进攻方向引向苏联境内，相反接受苏联援助，造成日本陆、空精锐完全消耗在中国大陆，造成上千万生灵涂炭。关于日本方面的作战盲点，作者提出：一，优越感太重，低估中国军队的实力；二，对中国地方军的认识有误，策动地方军投降的策略失败；三，低估中国政府长期抗战的决心；四，错过 4 次可以结束战争的机会。

由于时间和会议的安排，没有就刘凤翰的文章展开充分的讨

论。笔者从文章中感到,刘凤翰在军事史研究方面有相当大的资料优势,但也认为该文章提出的观点恐怕会在学术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论,更不会得到大陆学者的普遍认同。抗日战争的历史毕竟不是单纯的军事史,军事性的策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和国际关系,只从军事技术层面入手是否能够全面把握复杂的社会、民族、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当然,两岸学者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军作用的评价与认识,肯定会在一段时间里仍然见仁见智,但是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仍未到“最后关头”,恐不会有太多的响应。

关于是否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问题,刘维开教授在《决裂与隐忍——卢沟桥事变前国民政府对日和战的选择》一文中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变变的几年,就是国民政府选择对日和战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用1935年6月当华北形势危急时汪精卫致蒋介石电报中所称“决裂与隐忍”概括。刘维开把国民政府在上述时期对日政策的发展变化通过5次中日间冲突予以分析。第一次冲突即九一八事变发生,是和战选择的开端,国民政府基本上回避了和、战的问题,强调诉诸公理。虽然对国联不抱太大希望,但因中国不具与日作战的充分条件,当公理无法对抗强权时,就要面对和战的选择。第二次冲突为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因应日本的侵略采取了应变图存的策略,即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可以表述为“以战逼和”。第三次冲突是和战底限的确定,即在日军侵略目标又转向东北及华北后,从长城战役到签订《塘沽协定》,表明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但实力无法与日军抗衡,在兵临平津后曲意求和,但确认保全平津,保全华北为对日长期抵抗的最低限度。第四次冲突为河北事件和华北危机,日军步步紧逼,但蒋介石认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在日方压力下成立冀察委员会目的在争取时间,充实国力,是“以和备战”时期。至卢

沟桥事变发生为第五次冲突,平津失陷,中国对日最后关头已到,而国力亦有提升,以战图存的抗战开始。所以卢沟桥事变是和战的最后关头。

刘维开引用比较多的资料以证明和、战选择的困难和复杂,当然也想说明战争是一件影响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和、战之间准确把握时机的重要性。针对有的学者关于“隐忍”的批评,刘维开反问:就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势以及国力,面对日本的侵略或挑衅,如果政府不采取“隐忍”而采取“决裂”,使全面战争提前发生,其结果又将如何?

关于抗日战争中各时期或若干战役的作战原则、方针或作战方向的选择,是这次会议上另一个涉及比较多的问题。

余子道教授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的论文中就抗战初期淞沪会战全面展开后的战略方向转移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当时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作战中心的确由华北开始向华东演变,东战场上升为主要战场。不过他指出学术界关于这一演变出现原因的认识相当对立: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军队统帅机关高瞻远瞩,洞察敌情的战略非凡之作;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把战略防御重点置于京沪地区是无的放矢,未能缓解华北之危,反而中了日军的引诱、牵制之计,使中国军队的精锐损失惨重,陷入日军从东、北两面合击中原的被动局面。针对学术界这一相当对立的看法和争论,他对涉及这一问题的重要的历史资料即1937年8月20日陈诚向蒋介石的建议和同日南京军委会的命令,进行了仔细的考证和分析,他的结论是:抗战开始时的战略作战方向是在华北战场,中国统帅机关主动发起淞沪之战,的确有把日军主力吸引于东战场以牵制其在华北进攻的战略意图,但并不等于有计划地制定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的战略构想,至于后来战局发生变化,是由于诸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这一变化以

淞沪会战为转折点。

关于战略作战方向转移的得失,余子道认为在军事上是失大于得,并没有扭转日军由华北南下的方向。在那之后,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南北对进,夺取津浦全线,平汉线大部 and 陇海线东段,进而沿长江西进实现占领武汉的企图。而中国统帅部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才从实际上构筑实施持久战的计划,逐步形成对日抗战的东西防御的战略格局。

原刚先生的论文是《从上海作战到南京的作战——海军在扩大战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在1937年8月上海作战开始时,日军的最初设想是如果重创中国军队的话,可以尽快结束战争。但是后来却趁中国军队的退却而一举向南京进攻。日军统帅部认可了当地部队的行动,也认为通过进攻南京而结束战争。而从上海作战扩大到南京作战,终于导致了中日战争的全面化。对这一战争扩大的原因,以往多注重对陆军的研究。原刚先生考证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驻上海附近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作战计划,证明海军早在1936年就制定了沿长江占领南京的作战计划,所以海军在战争从上海扩大到南京的过程中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森松俊夫先生的论文是《长期战准备与战面不扩大方针的破绽》。他认为在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后开始了和平工作,而日本陆军部则开始考虑进行长期持久战争的准备,制定了大规模扩充军备的计划,对在中国作战的军队进行休整。2月16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大本营陆军部关于“在不扩大战线的基础上,占领地不再扩展,不实施新的作战”的作战指导要纲。但是,陆军部的一部分人和当地驻军坚持认为应当通过积极作战尽快解决事变。4月,在看到中国军队的主力在徐州出现后,大本营也立即制定了将其消灭的作战计划并加以实施,于是战线不扩大方针破产了。



提交会议的论文中还有一些是从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展开的,进而涉及到比较宏观的重大问题。

陈鹏仁先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利用掌握比较充分历史资料的优势,向会议提交了《近卫文 与中日战争》一文。近卫是在1937年6月4日继林銑十郎后第一次组阁的。在他上任后仅一个月另3天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中日间的全面战争。此后近卫又有两次组阁,在战争的许多重要阶段都有近卫的参与,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主要的战争罪犯。而陈先生的文章指出近卫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担任首相后,原以为具有控制军部的权威,结果事实与预想的相反,最终成为军部的傀儡。关于这一论点,陈先生列举如下事实,即:卢沟桥事变后近卫主张的是不扩大方针,努力收拾局面;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冲突,关注对南京及重庆的工作;主张与美国交涉缓和矛盾等。在回答提问时,陈先生进一步论述说:近卫对于无法阻止战争的扩大而感到自责,一直有‘反省’的意识,他特别引用了近卫在自杀前与次男通隆的谈话,以说明其对‘政治性的错误’的反省和自责。

陈先生的意见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担任评论的卫藤沈吉先生就提出异议,认为近卫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历史的罪人。

步平研究员的论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化学战》。该文章论及的是抗战史研究中涉及比较少的问题,特别是由于战后的东京审判,美国对日本军队的化学战责任刻意回避和掩盖,致使该问题未予追究。针对这一历史背景,文章首先从国际法的角度强调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化学战违背国际公约的历史责任,继而利用在中国与日本进行多年的调查以及文献资料,说明日本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就开始了化学战的准备,并不顾国际公约的约束。这一准备包括秘密建立研究化学武器的研究机构,设立制造化学武器的工厂,组建训练从事化学战人员

的军事学校等。文章介绍了上述机构的情况,并对战争期间生产的化学毒剂以及化学武器的数量、种类进行了具体分析。

文章特别指出,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对中国军民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但是担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竭力掩盖,规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制造了许多谎言,而那些谎言至今仍然被有的人所利用。日军在战败时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为了掩盖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甚至将一部分化学武器秘密埋入地下和投入江河,造成了人员的伤害和对环境的污染,成为战后遗留问题。由于战后美国别有用心地包庇,化学战的历史被掩盖和淡化,也影响到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正式承认和认真的解决。鉴于国际社会已在1993年就禁止化学武器缔结了新的公约,明确提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而公约在1997年已经正式生效,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该论文中在对日本军队的化学战问题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后,着眼于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指出:鉴于化学战违背国际公约及其与细菌战有密切联系,由此引导日本人认识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加害的历史责任是有典型意义的。

综上所述,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对中日关系许多问题的认识和观点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有相当大的差别,甚至有很明显的对立。长期的隔绝与意识形态的不同是产生对立的重要原因。但是通过今后日益密切的学术交流和互相了解,相当一部分认识的差异、分歧和对立是可以逐渐消除的。特别是有的差别和对立产生于对资料的掌握和了解,正如金冲及先生在总结时所说:“在关于战争的性质,即日本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的民族战争这一点上是没有异议的。至于差别产生的原因有许多,但是各自利用的资料侧重面有所不同,或者难以看到对方的资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这样的会议提供了了解以前不了解的观点和掌握以前不掌

握的资料的机会。’由于会议的时间短，每场讨论即使延长了时间，也无法针对那些问题全部进行深入地讨论，对此各方面都感到言犹未尽、意犹未尽。所以金先生说这次会议不能为某一问题划上句号，只能划顿号或逗号，“会议没有结束，今后还要进行下去”。

不过，在此还想补充的是，尽管时间有限，但对于个别问题的讨论或争论仍然是很有意义的，甚至是很精采的。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秦郁彦之间的争论。秦郁彦在日本以研究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闻名。关于卢沟桥事变，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新”证据，力图证明挑起事变的责任在中国方面。十多年前，他就提出所谓中国方面在河堤上驻兵和中国士兵产生错觉出于条件反射而开枪的推理，已经为许多学者指出了他的主观武断和缺乏研究的问题。而这一次，针对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在有些问题上观点的差异，秦郁彦先生在几次发言中都就卢沟桥事变的原因阐明他的所谓事变起因是共产党挑动的观点，甚至具体地指出是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所为。对此，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都明确表示反对，指出他的论点既没有事实根据，也不符合逻辑。例如刘凤翰先生就认为：如果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对那样重大问题的选择竟是受中共下层人员的挑动，岂非过于幼稚？金冲及先生则更指出秦郁彦是根据错误的情报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而他作为中共党史和文献的研究者，根本没有找到一点支持秦先生的证据。例如关于刘少奇的行动，秦先生的推理就是错误的，直接看过白区工作会议记录和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的金先生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并有文章发表，他说回国后将寄给秦先生。

（作者步平，194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荣维木）